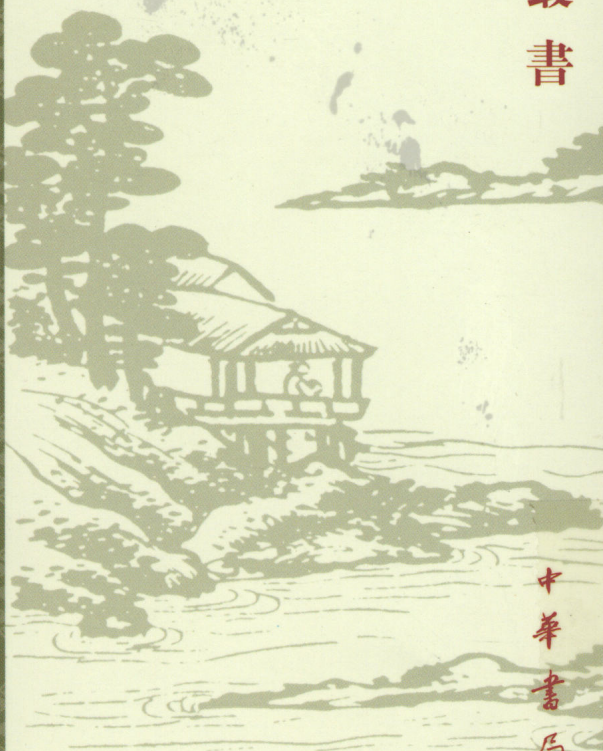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韓愈文集彙校箋注

第一冊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韓愈文集彙校箋注

第一冊

〔唐〕韓愈 著
劉真倫 岳珍 校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唐)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0.8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07401-7

I. 韓… II. ①韓…②劉…③岳… III. ①古典詩歌
-作品集-中國-唐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唐
代 IV. I214.23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74294 號

責任編輯:張耕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韓愈文集彙校箋注
(全七冊)

[唐]韓愈著
劉真倫 岳珍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6½印張·14 插頁·2500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318.00 元

ISBN 978-7-101-07401-7

前言

在中國唐宋以來一千二百年的思想文化譜系中，韓愈的樞紐地位早已得到學界公認。也正因為如此，早在宋代，「學者非韓不學」^①，五百家注韓，韓學就已經成為顯學。二十世紀初以來，已經問世的韓學著述不下三百種，韓學研究再次呈現繁榮的局面。從世紀初的標點排印本到世紀末的《韓愈全集校注》，韓集文本整理在現代科學研究的軌道上也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面對本書的選題，上述的判斷直接逼出兩大疑問：韓集的文本研究還存在推進的餘地嗎？韓集的彙校箋注還有必要重新進行嗎？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有三點：其一，面臨華夏文明的系統更新，當代學術界迫切需要傳統文化資源的深度發掘；其二，一大批新的原始文獻的發現，為韓集文本研究的進一步深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其三，現代科學研究理論方法的進步，也為韓學研究提供了遠比前人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就傳統文化資源的發掘而言，韓學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學術文化增長點。中唐是中國社會由中世紀向近現代轉型的起點，這是當代西方史學界的主流性意見，謝和耐《中國社會史》、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都秉持這樣的見解。作為「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開啓趙宋以降之新局面」的「承先啓後轉舊為新關鍵點之人物」^②，韓愈率先高舉起道統的大旗，標舉以治國平天下為目的的心性哲

學；以維護大一統爲目的的政治哲學；以弘揚自我、張揚個性、追求自由、追求獨創爲特徵的藝術哲學。爲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與發展開闢了先路，成爲「宋明新儒家之先河」^③，爲華夏文明的近現代轉型邁出了關鍵性的第一步。由於中唐開始的社會轉型過程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最後完成，這就使得宋元明清直至近現代的思想文化建設面臨著同樣的任務：宋學不得不接著韓學說，現代新儒學不得不接著宋學說。就這一意義而言，韓學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現實的意義。

不過，韓學在近現代思想文化系統中的樞紐地位儘管早已得到學界的承認，韓學自身的研究卻相當薄弱。就以高度評價韓愈地位的馮友蘭而言，他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共七百四十一頁，韓愈只佔據了兩頁；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六大冊共三千五百六十五頁，韓、柳、劉共佔三十三頁；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至隋唐三冊共二千二百四十四頁，韓、柳、劉、李共佔十五頁；唐君毅《原道》、《原教》四冊共二千三百三十四頁，韓愈僅佔四頁；更多的思想史著作例如牟宗三的《唐宋哲學史》著作《佛性與般若》二冊一千七百五十四頁、《心體與性體》三冊一千八百七十三頁中，根本就沒有韓愈的位置。思想界的主導性評價是：「韓愈在文學上佔著重要的地位，在學術思想界卻沒有特殊貢獻」^④、「愈生平致力於文爲多，於學則淺」^⑤、「韓愈本人的哲學思想十分貧乏而庸俗」^⑥、「其《原道篇》與他文之闢佛之說，若只就其所及之義理而觀，正如其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⑦。思想界的現狀向我們提示：理論思維的貧乏，根子在文獻研究的滯後。具體說來，長期以來對韓集文本

詮釋單純注重文學藝術層面而忽略思想文化層面的傾向，造成了理論研究的捉襟見肘。就這一意義而言，韓學研究還存在著明顯的薄弱環節。

就史料的發掘而言，陸續問世的一大批罕見的韓文原始文獻，如南宋淳熙元年潮州刻本《昌黎先生集》、淳熙十六年南安軍刻本《韓集舉正》、淳熙十六年南安軍刻本《昌黎先生集》殘卷，包括鐵琴銅劍樓影宋鈔、讀書未見齋影宋鈔在內的《韓集舉正》九部傳鈔本，以及宋代以來陸續出土迄今尚有綫索可供考察的七十餘種韓文石本等，為今天的韓學研究者提供了遠較前人優越的研究條件。

就研究方法的進步而言，二十世紀百年韓學的曲折經歷，為當代的韓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經驗與教訓。具體說來，自乾嘉以來接受現代西方科學求實精神從而逐步成型的言必有據的實證學風，到二十世紀末開始突破以隳突叫號、栽贓謾罵為能事的大批判風氣，韓學研究有了一個初步符合現代科學研究基本規範的學術環境；八十年代以來，融政治、經濟、思想、法律、歷史、文化乃至語言哲學為一體的社會文化批評，遠遠超越了以階級鬥爭、儒法鬥爭為標籤的庸俗社會學，為韓學研究開拓了更為廣闊的視野。

落實到韓集的文本整理，筆者秉持這樣的見解：作為華夏文明由中世紀向近現代轉型的關捩點人物，韓文的思想文化價值理應得到更為全面的深度發掘；作為宋學乃至現代新儒學的源頭，一千二百年間通過韓學的接受與傳播所體現出來的華夏文明思想文化系統近現代轉型歷程的內在脈絡，理應得到更為系統的梳理。在筆者的心目中，韓集文本整理的任務，就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無論

是校勘還是注釋、箋疏，都應該立足於實證，著眼於源流梳理。為達成這一目標，筆者在本書撰著之前，先期完成了以下工作：全面梳理宋元時期各種類型的韓文傳本，釐清宋代各種韓集校本、注本之間紛繁複雜的源流關係，撰寫了《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昌黎先生集〉考述》、《宋淳熙南安軍原刻本〈韓集舉正〉考述》、《韓愈〈昌黎先生集〉編次考》、《〈韓集舉正〉文獻來源考實》、《朱熹韓集校理文獻來源考實》、《論朱熹對方崧卿〈韓集舉正〉的批評——方崧卿、朱熹校勘思想比較研究》、《韓集五百家注引書考》等三十多篇韓集版本考證系列論文^⑧；完成了《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其中包括現存韓集宋元傳本十三種，亡佚集本一百零二種，選本五十種，引用過韓文的各類學術筆記三百一十種。考察宋代以來陸續出土的韓文石本七十四種，完成了《韓文石本考》。以宋淳熙十六年方崧卿南安軍原刻本為底本，採用現存九部鈔本中的七部作為參校本，並以《韓文考異》以及潮本、祝充本、文讜本、南宋浙本、南宋江西本、南宋閩本、南宋蜀本、魏仲舉本相參證，完成了《韓集舉正彙校》。全面梳理前人尤其是宋人有關韓愈生平以及詩文繫年研究的相關成果，撰寫了《韓愈家世辨疑》、《韓愈〈南行逾六旬〉考實》等系列論文，完成了《韓文類譜訂補》^⑨。全面梳理宋元直至近現代韓愈思想文化的接受與傳播狀況，撰寫了《從明道到載道——唐宋文道關係理論的變遷》、《韓愈「性三品」理論的現代詮釋》、《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天人關係理論的現代詮釋》、《道統：民族文化傳統——論韓愈道統思想的根本性質》、《五原的創作與道統的確立》、《論韓愈「性體道用」的心性本體理論》、《韓愈的義利觀及其歷史影響》等一批系列論文，完成了《韓文義理箋疏》^⑩。在此基礎上，筆者初步確定了韓集的校注體

例，並撰寫了《韓愈集彙校前言》、《韓文義理箋疏示例》、《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語詞訓釋解難》、《朱熹〈韓文考異〉摘疵》等專題論文，完成了《昌黎文錄輯校》^③，一方面將其作為韓集校注的試編稿，同時也希望由此得到學術界的反饋意見。總而言之句話：筆者心目中的韓集校注，應該能夠條分縷析地展現一千二百年韓集文本整理的歷史面貌，真正具有現代科學意義上的學術史高度。筆者以為，這纔是古籍整理的終極追求。

一、韓愈集文本研究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縱觀千年以來的韓集文本研究狀況，可以大致勾畫出一條U形發展軌迹：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宋代的韓集文本研究已經達到了極盛；通過方崧卿、朱熹的校理，後世的韓集傳本也已經基本定型。元明時期是千年韓學研究的谷底，韓學晦而不彰，韓集流傳也大多承襲朱熹本，沒能突破方、朱的樊籬。清中葉以後，韓集整理開始呈現復蘇的勢頭，《韓集點勘》、《韓集箋正》、《讀韓記疑》、《韓集補注》等校勘專著以及顧嗣立、方世舉等人的韓集文本整理著作相繼問世，為現代韓集文本研究開闢了先路；二十世紀初以後，韓集文本研究開始走上現代學術研究的軌道，迎來了又一個歷史的高峰。非常有趣的是：二十世紀初以來韓學研究的百年歷程同樣呈現出一條U形發展曲綫：二十世紀前半期，儘管有五四運動反傳統思潮的影響，韓愈作為新儒學道統以及桐城文章的不祧之祖也長

期處於被批判的地位，但韓學的研究卻沒有停頓；即便是在戰火紛飛的三十年代，新問世的韓學專著也有數十種之多。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三十年，是百年韓學的谷底，三十年間正式出版的韓學專著僅四種，其中舊著再版三種。八十年代以後，韓學研究再次復蘇，自一九七九年迄今的三十年間，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正式出版的韓學著述將近二百種，相關的論文數以千計。韓學研究呈現出一派興旺繁榮的景象。

（一）二十世紀前半期韓集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

二十世紀前半期的韓集文本研究上承清代學術緒餘，没能完全脫離舊學的軌道：乾嘉餘裔注重訓詁考證，桐城後學注重批點評論。不過，乾嘉學派的主要成就就在經學、子學、史學已經低了一個檔次，集部的研究差距更大，其成就遠不能望經學項背。就清代的韓集文本研究而言，陳景雲以下諸人，其水平固然遠遜於戴段錢王；《點勘》、《箋正》，也遠未能達到《經義述聞》、《讀書雜誌》的高度。所以，乾嘉學派在吸收西學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現代學術規範，在韓集文本研究的領域內，要到二十世紀初葉才得以體現出來。換言之，二十世紀初葉的韓集文本研究儘管没能擺脫清中葉以來陳景雲等人研究成果的影響，但就研究方法與學術規範而言，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理論研究的情況同樣如此，二十世紀初葉的韓文評論没能完全脫離桐城批點的軌道，但現代西方藝術批評的方法已經開始發生影響，韓文理論批評的水平已經遠非桐城可比。更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初葉的學者能夠將實證研究與理論批評結合起來，產生了不少文獻基礎堅實、理論思維明晰的重要成果。

刻版於一九〇〇年的劉成忠《韓文百篇編年》，爲二十世紀的韓文實證研究拉開了序幕。該書以年表的形式編製目錄，開卷了然，體例頗爲新穎。近代的韓詩繫年，自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之後已經相當成熟，近代學術界爲韓文繫年，應該始於此書。該書繫編年考證於題下，不過大多寥寥數語，較爲簡略。如《原道》題下注：「此文之作應在三十一歲答張籍書後，三十六歲送文暢序前，三十九歲上李巽書前。」^④全書儘管以「編年」名篇，但各篇有圈點，有眉批、夾注，篇末有評論，與傳統的桐城批點並無大異。發表於一九〇九年的李詳《韓詩證選》致力於從《文選》中追溯韓詩語源，全文討論韓詩六十九題近百篇數百條。如《元和聖德詩》一篇，引《離騷》及前王之踵武，證「以踵近武」，引張衡《西京賦》「乾池滌藪」，證「搜原剔藪」；引李密《陳情表》「急如星火」，證「急疾如火」；引左思《吳都賦》「峭格周施」，證「廬幕周施」；引楊雄《長楊賦》「天兵四臨」，證「天兵四羅」；引顏延年《侍遊曲阿後湖》「山祗蹕嶠路」，證「嶽祗業峨」。大多引證堅實，發前人所未發^⑤。發表於一九二六年的陳柱《證韓篇》從經史子集中廣泛追尋韓文語源，其具體引證非常精彩。如引《莊子·大宗師》「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證《原道》「堯以是傳之舜」一段文字文法出處；至於這段文字的取意，則引《孟子·盡心下》「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

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爲證^①。深中肯綮，不可移易。發表於一九三四年的徐霞《韓愈詮訂》，於文字訓釋頗多勝義，如《閔己賦》「曰余昏昏其無類兮」，引《爾雅·釋詁》釋「類」爲「善」；《南山詩》「冬行雖幽墨」，引《史記》證「幽墨」即「幽默」；《重雲》「窮冬百草死」，辨「窮冬」當爲「窮秋」；《城南聯句》「何用苦拘擥」，解「拘擥」爲「拘泥」；《鄆人對》「辨一邑里皆無孝」，「辨其祖父皆無孝」，引《廣雅·釋詁》、《左傳》定公八年謂「辨」字「義同徧」^②。訓釋準確，引證愜當。發表於一九三四年的李嘉言《韓氏繫年訂誤》考訂魏仲舉、顧嗣立、方世舉諸本繫年訛誤，其繫《李員外寄紙筆》於貞元二十年，繫《答張十一功曹》於貞元二十一年，頗堪注意^③。除此之外，梁廷燦《韓吏部文公集年譜六種考略》、層冰《韓詩劄記》、古直《韓文箋正》、陳柱《劄韓篇》、李澍《與陳柱尊教授論韓文書》、徐震《韓昌黎「南山詩」評釋》、程會昌《與徐哲東先生論昌黎「南山詩」記》等篇討論韓文作年、語源、作意，饒宗頤《韓文編錄原始》通過趙德《文錄》考察韓愈集的編錄，孫百急《韓愈的籍貫問題》、趙毓英《韓愈鄉里辨略》考察韓愈鄉貫里籍，陳寅恪《（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文史互證，都能做到言必有據，引證豐富，體現了現代學術的求實精神。

二十世紀初葉的韓文理論批評仍然沿襲桐城軌道，桐城晚期諸大家尤其活躍，其中吳闓生、林紓貢獻最爲突出。吳闓生的評論大多不脫桐城軌範，如《桐城吳氏古文法》評《雜說》「龍噓氣成雲」云：「起句破空而入，卓立如山。凡爲文最爭起筆，韓文起筆尤擅勝場，如此句與《雜說》第四首「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句、《送董邵南序》「燕趙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句、《南海神廟碑》「海於天之間爲物最鉅」

句，皆有斬關直人之勢，昔人所謂起筆來得勇猛，即此法也。」^④但不少評語現代意識較為濃厚，如《古文範》評《原道》「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云：「退之此語頗爲新學少年所叢話。實則今世之法，凡爲國民，皆負有納稅之義務，背此義務，故國法之所不容，於退之之說無異也。且專制之世，視君王若帝天，神聖不可犯。而此文獨曰：『君者，出令者也。』又曰：『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則固具有共和之真精神，而毫不帶專制時代臣下諂佞之臭味，則韓公之識實已復絕千古矣。」又評「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云：「以上二氏與吾儒並主教化，民所以窮。分利衆而生利少，是爲窮困之源，韓公所論與今世之學說固無以異也。」^⑤林紓的批評，理論意識更爲明確。如《春覺齋論文》概括韓愈碑誌特點云：「大抵碑版文字造語必純古，結響必堅騫，賦色必雅樸。往往宜長句者必節爲短句，不多用虛字，則句句落紙，始見凝重。」^⑥《韓柳文研究法》比較古文家與道學家短長云：「讀昌黎五原篇，語至平易，然而能必傳者，有見道之能，復能以文述其所能者也。宋之道學家，如程、朱至矣，問有論道之文習誦於學者之口耶？亦以質過於文，深於文者，遂不目之以文，但目之以道。道可喻於心，不能常宣之於口，故無傳耳。」^⑦除此之外，如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錢基博《韓文讀語》、《韓愈志·韓文籀討集》、胡懷琛《韓柳歐蘇文之淵源》、李辰冬《韓柳的文學批評》、朱自清《論以文爲詩》、程會昌《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發微》、《韓詩〈李花贈張十一署〉發微》等，都對韓文章法結構、藝術手法有不少精闢的分析，體現了二十世紀前半期理論思維的高度。

從總體上評價，二十世紀前半期的韓集文本整理還停留在簡單的標點斷句的層次上，這一類型

的韓集整理本，以流行的世界書局本、國學基本文本庫本、萬有文庫本、國學基本叢書本爲代表。這一時期還產生了兩種對韓愈全集進行校注批點的整理本：成書於一九〇七年的馬其昶注本和出版於一九二四年的蔣抱玄《注釋評點韓昌黎文集十卷詩全集四卷》。馬其昶本除選錄《考異》和五百家注的部分內容之外，還選錄了明唐順之至清吳汝綸等二十七家批點。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的主要成果得到了較爲完整的體現，這是該書的主要特點。該書徵引的沈欽韓《韓集補注》爲作者初注稿本，比通行的廣雅書局刻本多出數條，亦頗爲後代論者所稱道。但校勘注釋非此書所長。就校勘而言，該書以屬於朱熹校理本系統的東雅堂本爲底本，文字一遵朱本，基本上無所改訂，對於清末民初尚存於世的多種韓集宋元刻本，如劉允本、祝充本、文謙本、魏仲舉本、廖瑩中世綵堂本、王伯大本，該書無一採用。就注釋而言，該本注文極爲簡略，不但未能體現乾嘉以來文字、音韻、訓詁等學術領域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即便是傳統的注疏箋釋，也遠遠未能達到前人的高度；對前人舊注，「倣朱子《離騷集注》例」，一律刪去注家名氏，不但混淆泯沒了韓文詮釋的歷史演進過程，也不符合現代乃至傳統的學術規範。相比之下，蔣抱玄本雖然於韓集文字校理同樣無所作爲，但所作注釋引證卻要詳實得多。如《感二鳥賦》「愈東歸」，馬本未出注；蔣注：「唐建都長安，公居河南河陽，以貞元十年入長安，在河南西，故曰東歸。」又「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魏引樊汝霖注：「舊史《德宗紀》：貞元十一年六月，河陽獻白鳥。」馬注全文照錄魏注，而抹去注家名氏；蔣注：「鸚與鵠同，俗名八哥，體本黑色，故時以白者爲瑞。《周禮》：鸚鵡不踰濟。」又「志其一二大者」，馬本未出注；蔣注：「志，記

也，同「誌」。又「承顧問贊教化」，馬本未出注，蔣注引《後漢書》：「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又「累善無所容焉」，馬本未出注，蔣抱玄注引《漢書·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又「出國門而東驚」，祝允注：「驚，音務，馳也。」馬注照錄祝注，而抹去注家名氏；蔣注：「東驚，喻東歸也。顏延之文：朔鳥東驚，邊風南埃。」又「念西路之羌水」，馬注錄朱熹、姚鼐、沈欽韓三家之說，而無所按斷；蔣抱玄注：「羌，讀若鏘。反語助詞，與偏、乃同義。」又「增余懷之耿耿」，馬本未出注；蔣注：「耿耿，不安於心也。《詩經》：耿耿不寐。」又「彼中心之何嘉」，馬本未出注；蔣注：「心臟居腹之中央，故曰中心。《詩經》：中心藏之。」又「徒外飾焉是逞」，馬本未出注；蔣注：「謂外貌也。劉勰《文心雕龍》：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又「余生命之湮阨」，馬本未出注；蔣注：「湮，塞也。阨，窮也。」又「汨東西與南北」，祝允注：「《說文》：汨，水流也。《楚辭》：汨余若將不及」注：「去貌，疾若流水。」魏注：「汨音聿。」馬本照錄祝注、魏注，而抹去祝、魏名氏，完全不知道方成珪《箋正》早已辯證《說文》「汨訓治水」，「其訓水流者，《玉篇》之說也」；蔣注：「汨，漂流也。」又「辱飽食其有數」，馬本未出注；蔣注引《論語》：「飽食終日。」又「得良弼於宵寐」，馬本未出注；蔣注：「《書·說命》：夢帝賚予良弼。《宋書·文帝紀》：願言傳巖，發想宵寐。」兩相對比，得失自見。

除了全集整理本之外，這一時期還有若干韓愈詩文選本流傳甚廣，影響頗大，學術水平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如王懋《韓文評注讀本》、莊適、臧勵穌選注《韓文評注讀本》、高劍華《白話詳注新式標

點韓昌黎詩選》、吳瑞書《評注國學讀本韓昌黎文選》、羅蘇洲《韓愈文精選》、李笠選注《韓愈文選》等。其中莊、臧選注本十餘年間再版多達五次，可以看出其受歡迎的程度。在這一時期的衆多選本中，最有資格代表韓集文本整理學術水準的，應該是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唐宋文舉要》。高氏爲桐城晚期大家吳汝綸弟子，其書大量採入桐城批點，自不待言。真正值得重視的是：高氏的注釋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韓文注本，體現了二十世紀學術研究的科學規範與學術水準。劉大杰、錢仲聯評價：「本書的注釋詳博謹嚴：凡引書多注篇名卷數，引古書必分別真偽；引用古書注疏以解釋詞義時，也不是單純博徵材料，而是有別擇、有判斷，使讀者有所適從；關於歷史事實、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方面，引用材料，必取原始，職官典制，往往直接引用《唐六典》、《通典》等書，族姓則引《元和姓纂》等書；有關作家仕履或登科之年，也能做詳核的訂正；有關訓詁音韻方面，必根據《說文》、《廣雅》等書，佚書也必詳其來源，如《一切經音義》引某書等等，而於清儒的研究成果也多所吸收；在闡說文義方面，又能博採前人論述，同時也加入不少新的材料，詳舊注之所未詳。所有這類的注，都超越了宋明以來的某些舊注，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④應該承認：以上評價客觀公正，絕無夸飾標榜之嫌。今試舉兩例於次：關於《石鼓文》，歷來有周宣王、周成王、秦刻等不同的說法，高氏注《石鼓歌》，徵引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張昞《雲谷雜記》、汪中《石鼓文證》、張懷瓘《書斷》、寶蒙《述書賦注》、韋應物《石鼓歌》、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董道《廣川書跋》、程大昌《雍錄》、鄭樵《通志·金石略》、《宋史·藝文志》、馬端臨《文獻通考》、陳思《寶刻叢編》、楊慎《升庵外集》、王昶《金石萃編》、陸友《研北雜

誌》等多種文獻，最後考定爲秦刻，與現代考古學的結論相合，可見其考證功力及現代科學素養。又如韓集中「楊雄」，監本系統諸本均作「楊」，自朱熹訂作「揚」，其後韓集傳本均改作「揚」。高氏考證云：「韓集各本『楊雄』姓皆作『揚』。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卷十曰：『《楊震傳》：八世祖喜封赤泉侯。《刊誤》曰：楊氏有兩族，赤泉侯從木，子雲從扌，而楊脩稱曰脩家子雲（答臨淄侯牋），有似震族亦是揚。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扌相半，未知所從。仁傑按：子雲自序其先食采於晉之楊，號曰楊侯。楊揚字畫易相亂爾。今《千家姓》有從木之楊而無從扌之揚，《集韻》亦云：楊，木也，又姓。至揚則云：飛舉也，又州名。陸法言字書從木之楊注云：本自周宣王子，幽王邑諸楊，號曰楊厚。後并於晉，因爲氏。與子雲自序同。然則子雲、伯起皆氏木名之楊明矣。』段懋堂《經韻樓集》卷五《書漢書楊雄傳後》曰：『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序其受氏從扌，而楊脩書稱脩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偽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扌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後有之？』（案：吳斗南引劉貢父《兩漢刊誤》，未及子雲自序，斗南按語始引之，正指《漢書》雄傳耳，無所謂唐以後偽序也，段氏此說似誤。《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扌者，脩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云脩家子雲，以啓臨淄侯之訛笑。脩語正可爲辨偽之一證矣。」王懷祖《讀書雜誌》四之三曰：「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子有楊烏之才。烏即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明矣。」案：諸家說是，今據以校正。」謹按：楊雄姓氏，南宋以前刻本「楊」、「揚」混用，雖有劉邠《兩漢刊誤》、沈作喆《寓簡》訂作「揚」，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辯作「楊」，但均未

發生太大影響。就韓文而言，首先改「揚」爲「揚」的是嘉祐蜀本及《古文關鍵》，但遲至南宋中期，各種韓文傳本仍作「楊」不作「揚」，可見其影響不大。而南宋後期以下，各種文獻中「楊雄」絕大多數定爲「揚雄」。蓋寶慶、紹定之後，理學地位如日中天，朱熹所校訂的韓集成爲權威定本。「自有韓文，歷四百年，《考異》出而始勒成爲定本，自有《考異》，迄今又近八百年，誦習韓文者莫不遵用，更少重定。」^⑧高氏敢於懷疑朱本文字，其識見膽略，本來就高人一等。所考詳明精覈，也足以代表二十世紀韓文研究的最高水準。

（二）二十世紀中期韓集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三十年期間，正式出版的韓學專著僅有四種，其中錢基博《韓愈志》、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國學基本叢書本《韓昌黎集》三種爲舊著再版。錢萼孫《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雖然出版於一九七五年，但該書完稿於一九五〇年，在嚴格的意義上，還不能說是這一時期的學術產物。此外，童第德《韓集校註》雖然要到一九八六年纔有機會出版，但此書定稿於一九六八年，真正在這一時期完成的嚴肅的韓學專著，或許只此一部。但據該書卷首吳則虞一九七〇年序：「此稿成於二十年前。」如果嚴格計較，此書仍然只能算作二十世紀前半期的產物。如果把搜索的範圍擴大一些，黃雲眉《韓愈柳宗元文學評價》、章士釗《柳文指要》倒是值得一提。這兩部著作雖然不是專論韓愈，但其中討論韓愈的比重不小，視爲韓學專著也未嘗不可。更重要的是：這兩部著作無論是思維模式還是論辯手法，都典型地體現了這一時期的學術風氣，完全有資格代表這一時期的韓學研究。